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专 题 讲 义

(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

说 明

为了目前教学需要，我们编选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部分专题，作为本系高年级学生试用教材。

这些专题中，有的曾在黑龙江省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会所办的高校政治思想史讲习班，及中国现代史学会所办的中国现代史讲习班、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办的中共党史进修班等处讲授过，并由他们根据录音整理付印过。这次重印，都由讲授者作了删节、调整或修改，但是，还是比较粗糙。

本专题集是在教研室同志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并参考了社会上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林茂生、彭明、刘健清、詹婧韶、林章惠、杨奎松、牛军等同志。由林章惠同志负责统编，林茂生同志审订。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研究不够，所选的专题，材料的取舍，以及对问题的评述等，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

目 录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杨奎松 牛 军 (1)
-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潮……………林章惠 (25)
-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论战 ……彭 明 (101)
- 五四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彭 明 (134)
- 关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辩论 ……彭 明 (163)
- 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政治思想 ……林章惠 (184)
- 戴季陶主义批判 ……林章惠 (221)
- 中国托派 ……林茂生 (251)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詹婧韶 (312)
- 改组派产生及其灭亡 ……林茂生 (336)
- 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 ……刘健清 林茂生 (36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杨奎松 牛 军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它给“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转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世界观，使中国人产生了新认识，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本讲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和作用作一历史的分析和说明。

在中国，最早接触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十月革命前，他们曾大量地翻译出版过国外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并且在他们一些著述中也谈及马克思主义。

目前所知，最早在中文文献中提到马克思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在他1899年节译的英国进化论者颌德的《社会进化论》第三章（题为《大同学》）中，曾两次出现过马克思的名字（分别译为“马客德”和“马克思”），称其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社会主义是“安民新学”，并提到了《资本论》。^①文中还出现了恩格斯的名字（译作“恩格思”）。随

^① 见《万国公报》第121期第11—12页及第123期第16页，1899年2—4月。

后，在1901年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上转载了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文中又一次出现了马克思（译作“麦克司”）的名字，并介绍了德国社会党和第一国际（译作“万国工人总会”）。作者称马克思的学说为“均产之说”。

从1902年起到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思想界连续出现了两次社会主义传播的高潮。其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引进和介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当时国内出版的几十种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中，有将近半数的译著提到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象《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世界之大问题》等书，甚至整章整节地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在国外出版的《浙江潮》、《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等中文报刊里，也刊登过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文章。通过这些著译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热衷于介绍引进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兴趣。

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的。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年，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他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在以后的文章中，他还多次提到过马克思，并且引用过马克思的言论。^① 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的译文中，在提到马克思时曾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末提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② 此外，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以及由

① 见《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刊，《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14号等。

② 见《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

同盟会分离出去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天义报》上，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第一国际的历史，以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翻译了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随后，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介绍，还可以在《广益丛报》、《东方杂志》、《新世界》以及《民立报》等报刊上见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及社会党人都曾一度大谈特谈社会主义问题。社会党人煮尘宣称：马克思欲“废灭资本家与地主，剧绝贫富之阶级，以土地资本，尽归之社会或社会的国家，使一般人类共立于平等之地位，求经济分配之平均”^①，“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②。孙中山则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③，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归为公有”与亨利·乔治的“土地归为公有”，二者互为补充，遂“得社会主义之真髓”^④。

在二十世纪初，马克思的历史观、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已经为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耳食。^⑤而第一部比较完整地译成

① 《新世界》第7期，1912年8月14日。

② 《新世界》第2期，1912年6月2日。

③ 孙中山：《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

④ 同上。

⑤ 分别见于《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社会问题》，《最新经济学》，《天义报》15卷及16—19合卷，《民报》第4、5号，《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等。

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于一九一二年出现在《新世界》杂志上，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①。

当然，中国早期进步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以及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浓厚的兴趣，不过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善的理想社会的模型。落后黑暗的中国现状必须改变，然而究竟向何处去呢？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资本主义西方大国身上。但是，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留学或流亡到欧美日本，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治之症之后，他们中许多人自然对资本主义世界日渐强盛的社会主义之风，感到强烈的兴趣。孙中山1897年的英国之行，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

但是必须指出，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工人人数不过十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二点五。到1913年，中国工人人数不过六十五万，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点四。中国工人阶级还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得到传播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引进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时候，势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变成各种适合他们口味的社会主张。因此，他们一方面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和“实行”的社会主义，绝非“空想空理之一夕话”；另一方面，则自觉或

^① 见《新世界》第一——第八期，1912年5月19日——8月28日。另，马恩著述最完整的中译文是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刊载在《天义报》第15期上（1908年）。

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混同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宣称其社会主义是“救正经济之不平等”的一种社会学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其方法不过是“以土地、资本……诸公社会，使政府掌治之”^①，“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②由此不难看出，他们所认识的或所看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孙中山在1912年的一段讲话说得最为明白：“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此则“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之“疗疾之药石”，“卫生之方法”、“各国社会主义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口提倡麦克司（按即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联络，共图进行”。^③显然，上述社会主义观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甚至丝毫找不到一点马克思的历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其一，在客观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引进和介绍，主要是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启蒙和影响的结果。辛亥革命前，留日的中国学生最多达到十万以上。他们和中国在日本的大批流亡者不

① 巡耕：《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民报》第4期。

② 钱智修：《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东方杂志》第8年第6期。

③ 孙中山：《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

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且开始了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书籍的工作。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除了部分无政府主义崇信者在巴黎——上海建立的世界社出版的一些译自法文的无政府主义读物以外，几乎所有传入中国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和译文，都来自日本。甚至象《新民丛报》、《新世界》、《天义报》、《民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日文。就连辛亥革命后《新世界》转载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转载的《万国社会党会史》也是根据六年前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的日译文译出的。象我们上文所举的有关报刊转载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段落，更是直接来自日译文。当然，这种现象是难以避免的。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了解和感受，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消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因而造成了他们生吞活剥，囫圇吞枣地接受这种新思潮的情况。因此，他们引进和介绍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特点。

其二，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都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等的药方，一种标志着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们都要求避免“攘夺变乱之祸”，反对“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正因为如此，对于他们来说，避免资本主义，当然不是目的。梁启超一面宣称“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①“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②一面说什么“麦喀（即马克思）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今以此手段

① 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

② 梁启超：《干涉与放任》《饮冰室自由书》。

(指革命派所主张的土地资本国有)取之,则国家其乃先盗矣乎”!在他眼里,现在宣传国有土地资本,无非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①罢了,实业不发达,民智不提高,中国断无实行社会主义之条件。而革命派一方面认为“世界列国其受资本家之害未深者惟我中国,”故“大地列国之易行民生主义,无如中国”^②,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在建立一善良政府的同时,通过“定地价的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根本上主张推倒资本家”的“目的”,表示怀疑^③,甚至一度声明“在今日人道废绝,强暴横流之世界中,稍具人心者,孰不知土地财产为世界人类之共有物”,“社会主义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之复活之福音耶”,但是“吾国今日产业所以不发达者,实以无强大之产业团体所致”,“故受外人之侵夺亦自招而已矣”,“资本不发达,则社会之生产不得发达,中国之贫终不可救,不能救贫则必至于亡”,“要之在今日之中国不能不提倡资本家”,“极端之大同主义,与吾国今日之时势决不能相合也”。^④显然,这种一方面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弊害,力图以社会主义做“疗疾之药石”,一方面深恐“富人”利益严重受损,“实业”得不到发达的心理,是造成他们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原因。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②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见《民报》第4号。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67页。

④ 《中国之资本问题与劳动问题》(社论),《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是一个持久、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有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译文章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当时还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知道这些材料。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的。

中国思想界对俄国十月革命，同对俄国二月革命的热烈反响相比，一开始就表现出十分复杂的趋向。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封锁、压制有关。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不仅公开表示反对十月革命，而且堵塞了中国人了解俄国真象的主要渠道。当时上海帝国主义分子办的《字林西报》、《上海日日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蓄意歪曲俄国十月革命的真象，攻击和污蔑布尔什维克党的评论和报导。不仅如此，他们还俨然以中国主人的口吻，教训中国人民“不好听乱党的话”，要“规、规、矩、矩”，并称各国必须切实负起“责任”，“不要令中国做第二个俄国”。张东荪等是最早相信和附和帝国主义者论调的人。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俄国极端社会主义者，得寸思尺，得尺思丈，气焰愈张”^①，鼓吹要切实“防遏过激派”^②。孙中山等人最初对十月革命是表示欢迎的，他曾致电列宁表示祝贺，《民国日报》也发表过寄希望于俄国的文字。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俄国政局

^① 《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太平洋》1卷8号。

^② 张东荪：《防遏过激派》，《学灯》。

的动荡不安，加上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歪曲报导，他们中一些人一度相信“俄国今天这样的悲惨境遇，真是从古未有的残酷，终是和人道目的冲突的。”^①“我们东方亟应该研究免除这番危险”^②。由于“狼难得其真象”^③，一时在社会上造成“大多数的人，听见‘俄国’这两个字，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出产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传播出来扰乱世界。大家差不多把俄国看作世界人民的公敌。至于俄国内里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形，布尔塞维克究竟是什么样一种主义，十个人之中恐怕没有一人能够懂得明白。”^④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表示对俄国革命好感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吴稚晖、黄凌霜、华林、真风等无政府主义者；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吴稚晖等人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十月革命，称许布尔什维克解散议会、召集苏维埃、对德议和、提倡世界革命、废除国教和没收私人银行等项措施，宣称俄国革命“均贫富”、“为个人争自由”、“合于物理人情”^⑤，并认为列宁的主义“是要这世界的人，男女同一样、贫富一般齐”，而“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正大光明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这社会革命“是世界的自然趋势”^⑥。毋庸置疑，由于他们坚持认为“有政府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的社会主义，毫厘千里，自

① 戴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星期评论》4号。

② 沈玄庐：《人与物》，《星期评论》12号。

③ 戴季陶：《俄国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同上，26号。

④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评论》28号。

⑤ 《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劳动》第2号。

⑥ 《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2号。

巴枯宁马格斯以来，两派攸分，初非得可混为一谈者，”以为列宁的政权不过是暂时用来“推行其主义”，其国家不过为一时“旧党死争”之所迫，“非用以压制他人。”故随着他们了解到列宁的国家观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即劳农）专政的情况，他们的态度就自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走到反对俄国革命的方面去了。与吴稚晖等人相反，李大钊等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而且随着更多的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象，其认识也日渐深刻和正确。李大钊第一篇颂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他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新文明新潮流的关系，劝“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坚定地认为“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人群注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①。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进一步指出：“Bolsheviki”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要使“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创造一自由乡土”，“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②。他热情欢呼“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1、104页。

② 同上，第114、115页。

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开创人类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是改变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使他们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而随着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失败，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日渐巩固，俄国革命的真相进一步为中国人民所了解，社会舆论对苏维埃俄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各种报刊杂志大量地翻译刊登有关俄国历史和现状的文章，译载俄国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以及各种政治消息，刊登一切可以找到的游俄记述和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生平传记和言论。甚至在差不多被人捧为先哲的罗素诋毁苏维埃俄国的时候，国内不少报刊竟载文予以反驳，声称“革命首先就是强力的活动”，“要是强力专为压倒这种反叛的活动，无论用何种方法，不能说太严厉，”“若说苏维埃政府，有如罗素所说的那样的专制，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②。到一九二〇年前后，人们已经相信：苏维埃政府“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人民悦服”^③；“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世界人类一大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财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④；“现在世界已经有了真正纯粹由劳动农工，由穷人作主的地方了”，这就是“北边的俄罗斯”^⑤。特别是经历了“五四”爱

①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② 见《晨报》1920年10月28—29日；《新青年》第8卷第4期等。

③ 戴季陶：《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星期评论》第17号。

④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

⑤ 张赤：《打破现状，才有进步》，《劳动界》第6册。

国运动，对各个帝国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的人们，对于列宁领导的俄国两次通告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感到了强烈的震动。他们热烈赞颂这“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一边是虎视鹰瞵，千方百计要瓜分中国的各资本主义列强；一边是新生的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社会主义苏俄，孰是孰非，泾渭分明。无怪乎当时的中国青年要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①。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是不足怪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到一九二二年为止，先后有近三十种马列主义经典著述被译成中文，社会上以《新青年》、《星期评论》、《晨报》、《民国日报》等为首，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刊物，都不同程度地介绍或谈论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几乎所有谈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文章，都被迅速译成中文，登载在中文报刊上。这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犹如一阵飓风，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界。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们对于改造社会的认识这时已发生了飞跃。“根本解决”“社会经济组织”的呼声几乎响彻整个中国。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社会改革，一时竟统统找不到市场。人们宣称：“任何改革，必须求根本的解决”^②，“我们处在这为资本阶级作护身符的民法所

^① 《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9期。

^②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

支配的约法下面，想取得‘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事”^①，“社会上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大字”^②。所以，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③。所以要用“社会主义”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④。自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初步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工人运动、劳动问题也已引起社会的极大注意。尽管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暂时不要用什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⑤，甚至提出“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⑥。但人们多数都确信私有财产制度不改变，“社会的生产形态和私人所有形态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那么劳动问题也不可能有合理的解决”^⑦。“劳动者如果想要得到均平的待遇，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从新建社会不可”^⑧。但是，这旧的经济组织怎样打破，新社会又怎样建设呢？对这个“根本解决”的方法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

就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而言，主张以激烈手段变革社会的

①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

② 一粟：《对于劳动节的感想》，《晨报》1919年5月1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④ 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

⑤ 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

⑥ 《罢工的意义》，《劳动者》第6号。

⑦ 《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星期日》第22号。

⑧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

多是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少数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根本解决就是要“一切破坏从新组织”^①，认为“从一个旧社会组织变为一个新社会组织，单只让他们两者一个去自然崩坏，一个去自己发生，而不加以人力的促进，是不行的”，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就是用人力打破一切旧组织以创造一个新组织”^②。甚至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③，而“阶级斗争实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方便法门”^④。他们当中有些人谈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材料，但是，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却多半受到了历史条件和自身的阶级眼界的局限，或者把阶级斗争仅仅看成是“同盟罢工”的形式^⑤；或者宣称“现在决不是流血的时代表”，“决不能轻言流血”^⑥。而更多的人则以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是“一种根本推翻资本主义，脱离资本家的羈束，极和平极稳妥的方法”^⑦。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当时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的愿望。当然，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是欢迎的，甚至大有既然经济不发达的俄国能“一举以成大功，劳农政府日见巩固”，中国何独不能之慨^⑧。声称“俄国波尔色维

①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

② 《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一进化与革命》，《新青年》9卷2号。

③ 《刘仁静致恽代英信》，《少年中国》第2卷9期。

④ 《劳动节祝词》，《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

⑤ 仲九：《香港机器工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

⑥ 《刘静仁致恽代英信》，《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

⑦ 《罢工与合作》，《平民》第69期。

⑧ 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建设》第2卷第4号。